

YE MIANHUA 野棉花

陈国清◎著

前几天，我还在医院里。得肝癌是十四天前我的秘书彭丽告诉我的，不仅是这病，还有肺结核、胃病等多种疾病。

半年前，我还在公司里工作，肝癌之外的疾病，我还顾不上，还能带病坚持工作。自从得了这病，食欲一天天地减少，身体渐渐地不行了。实在无法，才放下了工作，住院治疗。经诊断：肝癌晚期。彭丽告诉我，据医生透露，我顶多还能活三四个月。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野棉花

YE MIANHUA

陈国清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棉花 / 陈国清著 . —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 ,

2013.4

ISBN 978-7-5402-3168-2

I. ① 野… II. ① 陈… III. ① 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
国 - 当代 ②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61973 号

野棉花

YE MIANHUA

作 者 : 陈国清

责任编辑 : 申 妙

装帧设计 : 黄 剑

版式设计 : 李 幽

出版发行 : 北京燕山出版社

社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 号

邮政编码 : 100054

联系电话 : 010-63555979

印 刷 :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: 301千字

印 张 : 11.75

版 别 : 2013 年7月第1 次出版

印 次 : 2013 年7月第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02-3168-2

定 价 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如发现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陈国清，男，汉族，生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住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金子场，高中文化。一九八二年参加工作，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三年在该乡农经农技综合服务站当专职采购员；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二年任该乡农技站站长；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七年任该乡铜鼓岭村、私大寨村党支部书记；二〇一〇年在该乡劳动保障所工作任所长至今。

目 录

野棉花	001
南雁西飞	089
安顺儿采购记	169

野棉花

前几天，我还在医院里。得肝癌是十四天前我的秘书彭丽告诉我的，不仅是这病，还有肺结核、胃病等多种疾病。

半年前，我还在公司里工作，肝癌之外的疾病，我还顾不上，还能带病坚持工作。自从得了这病，食欲一天天地减少，身体渐渐地不行了。实在无法，才放下了工作，住院治疗。经诊断：肝癌晚期。彭丽告诉我，据医生透露，我顶多还能活三四个月。

当彭丽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我时，我并没有感到惶恐不安，也没多少顾虑。说没感到惶恐不安：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已是九死一生的了，同时，病魔已经折腾了我长达十多年之久；说没什么顾虑：我是孤儿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妻儿。但我感到遗憾：上天给我的生命太短促了，我今年才五十五岁呀。

在这五十五个春秋里，我八岁读书，十一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，四年蹲监狱，十三年受管制，十九年是在冒险中闯过的和在病魔中熬过的。

上天在给我的这五十五年里，也太不公平了。我曾经有过崇高的理想，然而不能实现；有过美好而甜蜜的爱情，然而不能如愿以偿；有过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青春，然而不能有所作为。我觉得我失去的太多了。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里，我虽然腰缠万贯，但并不感到稀罕和满足。

现在，生命留给我的只有三四个月了。

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我没别的希求，也不准备安排后事，只是想将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来一个回忆，同时，用我真诚的心，笨拙的笔，写出自己的悲哀和欢乐。

在回忆的过程中，也许我要哭，要笑，要沉默，要呐喊……

我一生很少哭过，尤其是没有大声地哭过，也很少笑过，尤其是没有大声地笑过。今天，我可有时间坐下来，静静地考虑这些了。

我突然提出出院，这可慌了彭丽，她不知其故。

“钟秋叔，您身体这样虚弱，病情逐天恶化，怎能出院呢？”

“彭丽，你还不知道吗，我只是几个月的生命了，前段时间，我与蒋老板商量，谁来接班，人也落实了，现在心才算放宽了些。但是，我不能在医院里等着死神的降临，”我走下床来，坚决地说，“我要回家乡去看看！”

彭丽异常地看着我，好像我神经有问题。

“钟秋叔……”她扶着我说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还能走路，还能坐车！”我推开了她，“我要回去看一看家乡，在死之前，走走亲，祭祭坟，请你不要阻挡我，这是我对你的请求！”

“钟秋叔，我求求您，请原谅我吧，我不该把病的实情告诉您，使您颓丧、使您伤心……”彭丽乌黑的眼里闪动着泪花，愧疚而激动地说着。

“彭丽，你跟随大叔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大叔的性格？我不希望看到你的眼泪！”我安慰着她说。

“钟秋叔，我听您的！”她紧咬着嘴唇说。

彭丽驾驶着我的皇冠小轿车，向乡村公路缓缓地驶去……

这正值中秋季节。农村的空气异常的清新，家乡的景色异常的迷人。刚刚翻耕过的稻田，还带着泥土新鲜的气息；上了浆的稻子，散发出温馨的熟香；那成片硕果累累，压弯了枝的雪梨，在骄阳的照射下和秋风的摇曳中更加惹人欲馋；连绵起伏的群山，郁郁葱葱；鸟儿在树林里飞来蹿去，欢叫不停；清澈见底的小河里，伴随着淙淙的流水声，偶尔几尾鱼儿，在河面上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正陶冶着我的五脏六腑。

我们先将车停在了路旁，步行回到了“家”。

原来那破旧不堪的老屋和崎岖蜿蜒的山路不见了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栋栋造型别致的小楼房和那开山劈岭、村村社社相连的碎石

公路。

“哎，变了！”我坐在一块石墩上感慨万千地说。

“是啊，大叔，这些年来，农村的变化也真不小！”

我们正说着，从屋里走出一老妇人来。我还未醒过神来，可她先叫出我的名字。

“哎呀，原来是钟秋哟，你可回来啦！”

我一愣：是她，冯大妈。她叫冯桂芳，七十多岁了，瘦高的身材，花白的头发，二十多年没有见到她了，还是那么精明能干。她很和善，我们原来的邻居，与我还沾点亲，向来与我家要好。

“大妈，我回来啦，今天回来看您老人家来了，您身体还好吗？”我走近她激动地说。

“谢谢你的问候，身体还行哩。钟秋，你还记得我们家乡，还舍得回来看看。你走了近二十多年，还以为你怎么样了，再不能回来了，没想到，去年我们才知道，你还好好地活着，干着大事呀！”她上下把我看了个遍，既惊又喜，“看你也老了，好像有病，你的气色不好，身体也这样虚弱！”

我只是搪塞地支吾着，但没有告诉她我得了癌症。

“她是……”她看了彭丽一眼问我。

“我的秘书，彭丽。”我解释道。

她见彭丽既年轻又漂亮，随口问道：“你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哇！”我马上回答说。

“不要哄我，你有钱，你不是以前的向钟秋了，怎么说没有成家呢？”她不解地问。

我一再解释，没有成家，然而她总是不信。

乡亲们知道我回来了，都好奇地、亲切地围拢来问长问短。

我看到乡亲们高兴极了，激动极了。一时，好像我的病好了许多，人也年轻了许多。

“乡亲们，你们好哇！”我说了一句，喉咙哽咽了。我这个很少流泪的硬汉子，此时眼睛湿润了。

突然，我的肝部剧烈地疼痛起来了。

乡亲们见我脸在变色，豆大的汗珠直往下落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彭丽知道我的病发作了，急中生智地叫冯大妈将我安排在她家里。她们将我扶到了床上，彭丽给我服上药，这样，我又痛苦而艰难地熬过了一天。

至于乡亲们什么时候走的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只听彭丽说，他们守候了我大半天，一直等到我苏醒过来才离开的。

这几天，彭丽听到了乡亲们的一些传言。当她问起我与姚芹的事时，我的神经像电击了一下。

“彭丽，我病成这样，你不但不理解我，原谅我，反而还来刺激我，使我为难……”

“钟秋叔，原谅我吧！”她真诚地说，“是的，本来我不该伤您的心，也深知您的病情！我从来都是尊敬您的，爱戴您的！从而使您永远不受痛苦的折磨！我还把您当成我的亲人，我的父老，我的师长……您是一个硬汉子，您的事从来没有向我说过，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过。今天，我才从别人那里得知，您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一个平凡而坚强的人。我来侍候您是幸福的，真的！请理解，我不是想您的钱，不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邦斯太太……”她哭了。“也许，我远不如姚芹，她比我美丽、坚贞，始终不渝地爱您，而我……”

“彭丽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，你跟我六年了，但我从来没有要占有你的欲望。我疾病缠身，瘦骨嶙峋，又过了半百之年，已经是九死一生的人了，现在又得了绝症，我不能玷污你的洁身，不能毁你的青春！这不是说你比不上姚芹，其实，你与姚芹各有千秋，如你的文化比她高，比她细心……”

“钟秋叔，我叫您钟秋叔，就觉得别扭，后来不好意思，我多么

想直接叫您的名字呀，可是，您永远不要我这样，我只好洗耳恭听，只好服从。说实话，我是多么的爱您，多么的尊敬您！您注意没有，只要与我们接触的人，哪一个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缱绻的情侣？”

“彭丽，我知道你的心！”我用洁白的绸帕给她擦去满脸的泪花，示意她不要说了，我要休息。

彭丽噙着泪水，给我盖好被子，出去了。

在冯大妈家里，我们已经住了三天了。几天来，我走访了一些亲朋好友。他们来访了，我都热情地接待，包括姚芹的亲戚。他们走时，没有别的，只好每人送一些礼物。据彭丽统计，几天来，我送出去的东西已经近万元了。

在这里是不方便的，虽然冯大妈提起旧事，我家原与她们还有一些亲缘关系，我出去以后，又将我的自留地和柴山占了，我一再说没关系，反正那些财产我拿来也没用，就当是送给她的。但她总是过意不去，说了许多客套话，说了许多善意的话和赞扬我的话。她要我们无论如何住在她家里，说她家房子多得是，农村清静，空气又好，保证我们住下来过得舒适、畅快。

我深表感谢。考虑到病情，便对彭丽说，选择一个吉日，上一次坟，就准备回医院。

“钟秋叔，上坟就不去了吧，这一去，您又要伤心的，我怕您身体受不了！”

“彭丽，你知道我这次回家乡的目的吗？”我郑重其事地问她。

“不就是想回来看看亲人嘛！”彭丽说。

“你只说对了一半，”我沉重地说，“我回来另一个原因就是祭坟。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世吗？不是想了解姚芹吗？待祭坟时，我全告诉你！”

彭丽睁着明亮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
这天，我没费多大力气，就来到了乱葬山。乱葬山地处岳家梁南

山坡，海拔在三百五十米左右，这里地势开阔，土地贫瘠，一眼看去全是一片坟地。坟地分旧坟地和新坟地，新坟地也有附近乡亲们把病死的畜禽葬在这里的。东北边地势较高，是一片古老的旧坟地：坟地间有几棵稀疏的冬青树和马桑树，坟碑绝大多数是清朝道光年间修建的，现在保存下来的，上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和清朝康熙、嘉庆年间，下可回忆到民国年间。坟碑有圆头的、方头的、菱形头的，也有各种不同规则的。碑文石有大理石的，有龙骨石的，然而，更多的则是本地上好的青石料。无论是大理石，还是龙骨石，或是本地青石料，做得都极精巧别致。大理石和龙骨石，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的，它们产在云南和四川西部的江油。可想而知，那时的交通不便，全靠人力搬运，得要花费多少人力和财力才能搬运到这里来！葬在这里最大的官员，从明清时算起，有进士、举人、秀才。民国时期有旅长、团长、营长、大小地主。然而，更多的则是贫民百姓。据说，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风水宝地，方圆上百里都知道这里有个乱葬山。无论是豪绅地主，还是穷苦贫民百姓，人死了，只要能葬在这里来，下辈子人就有好运。是豪绅地主的，世代不得衰败；是贫民百姓的，这辈穷下辈就要翻身，就能走好运，就能当官发财。这里有些碑文十分考究，特别是豪绅地主的坟碑，有极高的书法和历史研究价值。走入这片古坟地，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宫殿。可惜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将这一片古老的坟地绝大多数破坏得东倒西歪，面目全非，七零八散了。但也有一部分，修建得挺坚固，没有被破坏了。西南边，地势低洼，是解放以后死人葬的坟地，这里地势比那片古坟地面积大得多，原来是一片开阔的良田。

新坟地没有树木，然而却长满了荆棘。大小不等的新旧坟堆，看上去像是星罗棋布。坟与坟之间，除了荆棘外，那便是野棉花。野棉花开满了山坡，开满了荒地，开满了坟堆。瑟瑟秋风，将漫山遍野红里透白的花儿摇曳着，好像是千万颗星星在闪烁。这里的乌鸦、黄

鼠狼和野狗掏着不知是人骨，还是畜骨，到处乱窜着、嘶叫着、啄食着，委实可惧！再加上阴沉沉的天气，就更增添了可惧的气氛。

我们来到了西南方向的坟堆间，找到了姚芹的坟。我将一束鲜艳的野棉花虔诚地放在了她的坟头上。我知道这七座坟，除姚芹外，他们六人，包括姚老师，都是在“文革”中活活地给折磨死的。

“彭丽，你害怕吗？”

“阴煞煞的，太可怕了。瞧，那些荒坟，乌鸦、黄鼠狼和野狗，加上这阴沉沉的天气，可怕，太可怕了！”她胆怯地说。

“其实，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里有很多人死得太惨了！他们有的是在一九五八年错划成右派屈死的，有的是在建食堂时饿死的，有的是在‘文革’中搞武斗白相残杀和被乱棍打死的。瞧，这前六座坟中，是死于乱棍之下的，其中这打手也有我！”

“什么，有您？”

“是的，有我。”我平静地说，“不过，那时我不是人，而是一支枪、一把刀、一条棍……是被人监视、支配、利用的呀！”

“钟秋叔，我实在不明白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您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吧！”

“那好，你听着。”我将姚芹二寸的半身照片从钱匣里取出来递给她，说：“我从来没有给你讲过我的身世，也从来没有把姚芹的事告诉你，我一生虽是痛苦的，但我不愿把痛苦告诉给任何人，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再去伤害一个人的心呀！一次，在清理旧物时，像匣里有一张陈旧、美丽、清秀的女子相片，背后写着：将终生的爱献给你——姚芹！落名是我。你问我，她何时何地何故而死，我只是摇头，默不作声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了。这几天，我回来了，冯大妈可能将她的死因告诉给你了！”

“没有，”她说，“她认为您早成家了，不但有一个漂亮、贤惠的妻子，而且还有几个天真可爱的孩子。我要她告诉您的身世，她只

是说您原来在家吃了许多苦，受了许多罪，除了说这些外，就什么也没有说了。”

从彭丽真诚期待的目光中，便明白她至今还不知道我的身世和姚芹是怎么死的。

我坐在姚芹的坟前，左侧是她父亲的坟，这里没有别的标记，只是在十九年前，坟前栽的常青树，现在茁壮地、郁郁葱葱地、枝叶纷纷披地长满了坟头。

我接过彭丽手中珍贵而发黄的照片，看着姚芹，她在向我微笑，仿佛她就在我的眼前：那妩媚的笑容，显示着她无比的美丽、真诚、忠贞、倔强和对新生活的向往……

—

一九五九年，我才十九岁，在县城里读高中，由于成绩优秀和组织能力强，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，被选为学校团委副书记、组织委员、学生会主席，在师生之间有一定影响。一九六〇年，食堂生活是紧张的，全国人民都在挨饿，我也不例外。这年春天，我回家来，一路上所看到的，净是一些饿得偏来倒去的人。到了生产队，与在路上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。家里好久没有揭开锅了，每顿只有社里分的一人一碗照得见人的稀饭。父亲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，他整天的口粮全扣了。原来他在队里养猪，那时由于科学落后，不知道什么叫氨基酸中毒。一头母猪，白天还是好好的，晚上吃了刚煮熟的青菜，第二天就死了。父亲将猪死的情况报告了队委会，愚昧、蛮不讲理的个别队干部，硬说是父亲有意将猪毒死的，非赔不可。试想，在那个年代里，一切都是公有，一切都被没收了，除了简陋的、破旧的、一文不值的家用东西外，哪有钱赔呢？父亲无奈，只好乞求队干部原

谅。他们不但不原谅，反而对他更残忍、更毒辣，接连吊打了一天两夜，还不肯罢休，又用“鸭儿浮水法”逼他承认。他、他受不住饥饿、毒打和冤屈，便悬梁自尽了。

父亲的死，给我的震动是巨大的！饿殍遍野，横尸街头的灾民，浮夸风的刮起，怎不使我这个睿智成熟的青年深深地思索呢？

我带着迷惘、悲伤而又沉重的心情，回到了学校。

到校后，我再也没有心思学习了，我把一九五八年以来的运动，来了一个全面的回忆和反省。

当然，我不是先知，更不是天才。在校时，我读过大量的中外书籍，尤其是哲学，其次是文学方面的。当时以我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口若悬河的本领，组织起了一些教师、学生、城市工人和部分郊区农民，对一九五八年反右运动和一九五九年建食堂，来了一个大辩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参加的人数不下万人，会议五十三次。在当时，声势之浩大，影响之深远，是令人瞩目的！然而，后来我却以反革命罪入狱四年。那年，我才二十一岁呀！

不仅是我，受牵连的还有我的方开敏老师、谢明进同学、工人代表吴利东同志、农民代表陈锋同志，都分别给了他们管制，下放和严重警告处分。除了谢明进同学和陈锋同志外，他们都在“文革”中迫害致死了。

二

四年刑期满了，母亲就在我被捕后的五个月里，因想念儿子悲愤成疾，离开了人世，享年才四十三岁。我回来了，家没有了。原来三间旧草房，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和一片荒草。看着这一切，想到屈死的父亲和饿死的母亲，真想号啕大哭一场。然而我忍住了，去上了父母

的坟。

我站在母亲的坟前，虔诚地默默致哀。恰在此时，冯大妈来了。

“哎呀，钟秋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很早就在家里等你，有人说你到这里来了，我就来找你了。”她惊讶地说，“哎，看，你比在家时壮多了，只是脸黑了些。来，孩子，让大妈好好地瞧瞧！”说着就流下了泪来。

此时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，我是第一次回来见到亲人。看到了冯大妈，就像见到我的亲生母亲一样，拉住她，悲伤地啜泣起来，诉说自己的委屈。

“大妈，多谢您的关心，我是来看看父母的坟。母亲临去世时，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来得及给我说，就这样地离开了人世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我跪到母亲的坟前，大哭了起来。在冯大妈的劝慰下，我好半天才离开了那里，就这样暂时住在了她家里。

冯大妈一家四口人，丈夫伍大伯半身不遂，瘫痪在床。大儿子在部队里，幺儿子半聋哑，她家贫农成分，又是军属，我怕连累她们，就自己动手打石头，打砖头，加上冯大妈一家帮忙，东家要几捆稻草，西家要几根竹子，好不容易才搭起了两间草屋和一个简易的灶房。这样，从此我就一个人独立生活了。

我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回来的，一九六六年，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。在这一年里，是我们的党、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人民走向深重灾难，同时又是我们敬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倒霉时期。

十年浩劫从此开始了。

我回来的第二年，就戴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，列入第九种人，除地主、富农外，那就是我们这类了。在当时，在人们的眼里，算是最坏、最危险的敌人。要是人民群众一天不注意，不提高警惕，我们就要兴风作浪，就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就要使铁打的社会主义江山改变颜色。一句话，就要复辟资本主义。